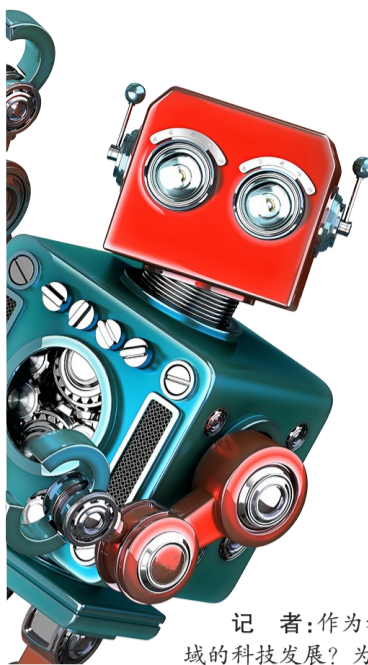


科幻访谈

“讲述”是人类处理世界复杂性的一种方式

——访科幻作家慕明 □本报记者 康春华



记者：作为科幻作家，你关心哪些领域的科技发展？为什么？

慕明：我持续关注领域有三个，彼此之间是相互缠绕的：认知科学、信息技术和科技的社会发展史。认知科学的吸引力来自它不断揭示“我们以为是固定的东西，其实是可塑的”。记忆的重构性、语言与大脑的协同演化、想象力的可训练性，这些发现一再提示我们，“人”这个概念远比我们日常理解的更具流动性。这和我写作的核心问题，即“人”是什么，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人”，是直接相关的。

信息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知、判断、记忆、交流和共情方式，它们不只是工具意义上的改变，而是在改造人和现实之间的接口。对我来说，这比单纯的技术更新更值得警惕，也更值得书写。

科技的社会发展史则是更宏观的关切。青铜器为什么可能是古代政治权威的起源之一？社交网络的规模化效应为什么会稀释个体的共情资源？这类问题让我意识到，技术改变了权力的形式，这会反过来更进一步影响个人处境。我认为，对技术后果的想象力，是推想文学最核心的能力之一。作为曾经的软件工程师，我对技术带来的后果一直比较敏感。技术不是中性的背景板，它会改变社会结构、改变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改变什么东西能被看见、什么东西会被遗忘。某种意义上，我写科幻或推想小说，也是在借助技术问题去逼近更深层的现实问题。

记者：你比较关注哪些人文社科类的话题？

慕明：人文社科话题和社会热点是我写作的起点之一。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写科幻小说和推想小说，一开始想得很简单，试图利用自己的技术背景，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去切实推演一些新技术，尤其是信息科技可能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与社会热点高度相关，同时也在各种层面上呼应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思考。

这些年，我长期关注的人文方向，一是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与认知的交叉；二是科学和文化史，因为理解范式转移的过程，比理解任何单一的科学结论都更重要；三是关于叙事与权力的历史研究。

在小说创作中，我一直想探索信息传播方式变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变化；神话、历史、古典文化、人文思想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如何被重新理解、重新讲述；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是否能经由技术变革，获得新的可能性；阅读、书写行为本身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展如何耦合等。对我来说，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恰恰是科技问题的基础。比如，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变化、社交媒体时代的“回音室”效应、注意力的稀缺等，这些不仅是热点，也是理解今天现实结构的钥匙。

另外，我也很关注那些看起来很细小、更私人，但实际很能体现时代精神状态的话题，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劳动、育儿经验、个体如何在高速变化的信息场中维持自己的感受力和判断力等。真正值得写的，不一定总是宏大事件，也可能是那些被忽略的、微弱但能引起共鸣的经验。

记者：科技更新迭代之快，是否对你的文学创作心态产生了具体影响？

慕明：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会制造压力。现实变化太快，旧的表达方式很容易显得滞后，尤其当我想处理技术对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层改造时，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传统形态的长篇科幻小说，未必足够有效。这个判断直接影响了我最近几年对长篇创作的调整。另一方面，它让我更清楚自己要写什么。我不想把技术作为背景设定或者未来装饰，而是把它写成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力量。文学不能只做即时反应，也要去处理那些更新速度却更深层次的问题：人怎样理解世界，怎样被叙事塑造，怎样在变化中维持反思能力。此外，还有心态上的影响。我之前提出了“稀疏影响力”的构想，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不是最大声的，也不是传播最广的，但它会在某些人那里留下印记，并通过他们的创作再度传播。对于一位坚持长期主义的创作者，认清这一点，会比追逐即时的传播效果要更清醒、更可持续。

记者：在你的写作中，科幻表达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慕明：在早期的短篇里，我更依赖“概念突破”和“合流”这两种方法，即用一条清晰的技术推进线索，串联起人物的行动和认知演进，故事到最后会有一个认知上的范式转移时刻。这种写法对于建立读者的阅读期待、展示推想文学的核心方法论很有效。但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就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之后，我发现单纯的概念突破结构难以支撑更大篇幅的创作。许多认知的改变必须经由身体、经由无可回避的切身经历才能真正发生。这让我更靠近了第一人叙述事，更靠近了当代世界文学，乃至自传体小说的方式。这不仅仅是让塑造的人物去经历某种技术推演，而是让叙述者更直接地站在认知变化的现场。所以我现在的写作更有意识地让科幻设定和个人境遇、社会变迁彼此融合。文学性、社会性和推想性的部分，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构，设定的核心概念和叙事的结构形式应该互相呼应。这不只是技巧上的改变，更是认识论上的转变。

我从小很喜欢《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种细腻又宏大，既反映复杂社会现实和大时代变迁，又能够对抽象问题的严肃思考，甚至是本质性的理论建构融入故事的作品。我最近读了《魔山》，也许当下这样厚重的作品未必有那么多理想读者，但对我个人而言，它仍然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作品形态。它和心灵本身一样，足够复杂也足够精密，是合适的容器。

记者：科幻设定方面，你如何看待各类大模型所能给出“方案”和细节，又以何种心态面对这种状况？

慕明：我曾在其他采访里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种创造力讨论：一种是技术型想象力，另一种是概念型想象力。

在技术型想象力方面，大模型做得很好，比如，给它一个明确的“what if”条件，它的推理能力强，能给出很多具体设定或者场景细节，创作者可以逐项考察。这样用起来效率很高。但在概念型想象力上，它就没有那么擅长了。让大模型直接生成一个大的思想实验或设定，它通常只会提供一些比较常规的选择。我在跟AI合作时就经常需要提醒它：“如果再加入其他条件，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

这样才能让它提供更更新颖的方案。创作者跟AI互动的实质，其实是在帮助AI建立一个新的问题空间以及对应的解空间。大模型本质上是在预测概率，默认状态下给出的答案肯定是概率最高、最俗套的回答。必须人为地设定一个窗口，把它的预测范围调整到一个更小概率、更特殊的空间中，甚至为它打开新的维度去思考。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做的是开辟新的问题空间、定义新的科幻或推想小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直接让AI写出一个新故事。我们只能把问题逐步拆解，最后再整合成一个新作品。

记者：AI时代，我们应当如何定义、区分真实与虚假？

慕明：我一直关注AI技术的进展。在我看来，AI技术的挑战和行业规范的失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在新的内容生产机制之下，如何定义、区分真实与虚假。除了个人层面的“真与假”，也需要考虑整个信息系统的真假问题：我们如何避免被大量二手、未核实的信息淹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创性的危机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什么叫作真正的认知更新，而不是对已有素材的重新排列？只是技术让这个问题的边界变得更清晰了，也让那些停留在表层的“创新”更容易被识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创作者而言，怎样分辨真与假，怎样更有效、更负责任地表达，都是最重要的课题。一方面，创作者需要保持更高度的警觉，也需要更严肃的思考，创作是不是需要更明确地体现出自省、反思和独特性。另一方面，在所有人都能表达自我，但仅有少数人可以获得发表、出版机会的年代，创作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是否需要更明晰和更贴合现实的考量。AI时代，如何建立真正的信任，这也是我现在关注、思考，并尝试写作的核心问题。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信任是比爱和理解更底层的存在，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人与技术、人与系统之间。至少对于我而言，无论是作文还是为人，在群体中的责任与个人的真实需求同等重要，真正的故事也即存在于二者的平衡之间。

记者：你如何看待人类的想象力？

慕明：在我看来，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能力，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能够在混沌的信息中建立意义的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数十万年的变化中真正依赖的东西，是一种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适应能力。叙事是这种能力最古老的形式。从寒夜围坐讲故事的时代，到我们今天面对的信息洪流，“讲述”始终是人类处理世界复杂性的一种方式——不是逃避它，而是试图理解它、暂时掌握它。我对写作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这个功能的认识。我始终相信，深度的文字叙事作为一种对认知能力的训练方式、对抗信息简化的方式，在信息充分饱和的时代里并没有失效，反而可能更难得。对我个人而言，想象力是我最后的堡垒。经历了许多现实的问题，我的自我叙事尽管四分五裂，但仍然依赖于讲故事的能力。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曾说过：“我恳请你们，不要对那些讲述故事的人过于苛责——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将自己所观察到的如实道来，却并未声称那便是故事的全部，也未声称那便是故事的真相。”聊以自勉，也与诸君共勉。

新作快评

镜子里看到的，从来都只有自己

■胡凤凡

回望科幻文学的诞生与演化，其脉络始终与女性创作者的实践密切相关。《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被视为“科幻之母”，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中，以厄休拉·勒古恩、乔安娜·拉斯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则为其拓展了更加开放的面貌。近期出版的中国女性科幻作品选集《陌生的女孩》也是当下女性话语意识觉醒与成形的结果。

《陌生的女孩》由青年科幻作家顾适主编，集结了9位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原创代表作。这些作品创作并发表于2019年至2024年，集中呈现了中国女性科幻写作的多元面貌与前沿探索。

作为里程碑式的革新者，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消解两性生理差异的科幻书写对女性身体与社会性的反思，构成女性科幻探索的经典母题。《陌生的女孩》中，王岑岑《与妻书》以极具戏剧性和幽默夸张的口吻，讲述一对夫妻因女方意外失去生育能力，丈夫接受人造子宫“女媧一号”植入手术孕育胎儿的故事。当性别身份与生育功能分离、互换，相互理解能否随之产生，这篇作品提出的问题值得思考。此外，选

集的另一大特色是女性视角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关怀和预测。与征服故事不同，女性科幻强调科技对关系、照护与日常生活的影响，昼温《偷走人生的少女》中的女性情谊，顾适《魔镜算法》中的亲密关系都成为故事的核心，而非边缘背景。两篇小说的共同点是假设科技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识和他人的捷径，人类可以为此承受多大的代价。尤其是，当能够借助脑科学实验同情他人的知识和记忆，利用“视域”AR隐形眼镜读取他人的表情和情绪，我们还能保留多大程度的自主选择？我们又是否会记得，我们窥伺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审视我们？作品提出的假设，某种意义上就是未来人类的境遇。

“人想从镜子里看到的，从来都只有自己。”正因如此，后续篇目对“去人类中心主义”“去中心世界图景”主题的集中呈现，或许恰是编者的有心为之。迟卉《火星基地整齐齐》是一篇将猫奴、强迫症、创伤记忆与母女关系写入城市管理人工智能体内的科幻小说。故事中的AI是由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高龄老人意识上传而成，她管理秩序、维系运转，却完整地保留着作为人类的创伤、情感与疾病。作者由此对“完

全理性的AI更优越”的技术神话提出质疑。靛灵《风安》记录的是在对开发星球进行生态改造之前，一组女性科学家结伴对原生生物资料进行抢救考察。作者没有做出非此即彼的道德评判和呼吁，而是提醒读者要尊重生命的不同可能性。糖匪《半篇半调×2》将视线拉回，体现出严肃的现实关怀。海洋污染带来的微塑料沉积悄然改变着小岛上的居民，没有经受过环境熬炼的人被自然淘汰，留下来的是逐渐“无机物化”的塑料人，他们代谢缓慢，因而皮肤紧致、体态年轻，不再有情绪和欲望，长寿不朽。而美妆博主陈青青的走红正来源于她身上“物”的气质，叙述者说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人们恋物……他们甚至不用先将她物化。”

总之，《陌生的女孩》完成了一次对女性科幻创作的回溯与致敬，并从当代社会生活的个体经验出发，打开了一种新的想象维度。正如选集的附录所言，女性科幻关注的是尚未被完整讲述的部分，她们不急于给出答案，更倾向于不断提出问题。这既是一次开始，也是一种邀请。

（作者系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

新书推介

刘洋，《文学计算导论》，科学出版社，2025年12月

该书是一部深入探讨文学作品量化分析方法的专著。从19世纪的手工文本统计分析到数字时代利用计算机技术的系统研究方法，该书不仅回顾了文学计算的历史渊源，还探讨了如何通过数学模型、特征量建构、数字细读等方法解析文学作品，揭示了其内在的隐藏结构和普遍规律，展示了文学计算这一跨学科前沿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潜力。



戴维康、张琰琛，《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4月

瑰丽的绿松石铜牌饰、神秘的三星堆青铜头像、深埋的御器厂碎片……该书向读者生动细致讲述了10个真实的文物修复故事，尽显先民淬炼审美工艺的智慧。该书两位作者均为文物修复领域资深从业者，以匠心融合传统修复手法与当代数字科技，在古老的文物修复中传递新理念、新方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科普面面观

如果你经常在网络平台上浏览科普内容的话，相信你会发现，一谈到不用刷题也能学好物理，那么你会想起“不刷题的吴姥姥”；一谈到通过漫画来学习科学知识，那么你会想起“混子哥”；一谈到“小学二年级”学过的各种复杂公式，那么你会想起“毕导”；一谈到“水猴子”，那么你会想起“无穷小亮”；一谈到“左一博士”，那么你会想起张劲硕……

从科普图书阅读的角度来说，同样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比如，阅读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作品就是在了解基因驱动的自然选择；阅读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著作就是在了解进化发挥作用的一系列更广泛的过程；阅读加拿大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的部分作品就是在了解关于进化论的观点如何解释人类行为；阅读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有关宇宙学的著作就是在了解被科学家们认为是真实存在但仍缺少经验性证据的宇宙的特征……

实际上，这就涉及科普的标签化，或者说人格化。美国学者德克兰·费伊在《聚光灯下的明星科学家》一书中写到，现代社会所塑造的“明星科学家”，本质上就是科普人格化的集中体现，也就是通过赋予从事科学传播的人可感知、可亲近的一种人格特质，让科学内容以更具温度、更易接受的方式触达公众，“来激励新思维，驱动科学争议，强化公众的理解，动员社会运动，并塑造政策”。

用当前更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个人IP。在科普领域，个人IP的打造正日益成为摆脱科普困境、提升传播效能、拉近科学与公众距离的重要因素，它以人格化为桥梁，构建信任、传递温度、凝聚共识，进而实现传递知识、培育理性、提升素养的目标。

科普人格化的出现符合传播规律与公众需求。“缺失模型”曾作为20世纪主流的科普模式，认为公众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知识，科普就是科学家和专家将正确的科学知识单向灌输给公众，补足公众的“知识缺口”，从而让公众理解、接受并支持科学。大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往往缺乏情感温度与互动性，会让公众对科学产生疏离感、敬畏感，甚至抵触心理。在信息以指数级增长的当下，即便兼具科学性、实用性的科学内容，也很难在海量信息中占据优势，无法引发公众的深度共鸣。与此同时，注意力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公众更倾向于接受有温度的信息，而算法推荐也更青睐具有辨识度、情绪价值的信息，科普人格化恰好契合当下传播环境与大众审美诉求。

科普人格化以人格为纽带，有助于构建稳定的信任关系，让科学传播更具说服力。人们天生倾向于信任具体的人传播的硬核知识，而非单纯的硬核知识本身，这种“信其人，故信其言”的心理机制，使得科普人格化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因为这可以打破传播壁垒，提升科学内容的接受度。

从信任的角度来说，通过真诚坦率的表达风格、亲切温和的沟通方式，甚至是生活化的一面，科普人格化能够快速拉近与公众的距离，消除公众对科学的陌生感。比如，自媒体博主“毕导”经常以幽默接地气的语言解读身边的科学，从接地气一直讲到桃花源，口语化的表达和诙谐的画面也会让公众愿意主动倾听和学习，甚至主动讨论、构建其中蕴含的科学知识。这种基于人格建立起来的信任，远比单纯的知识灌输更具传播力，也能够让科学观点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有效提升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科普人格化降低了公众走近科学的门槛，让科学变得可及且易懂。好的科普要尽量“去术语化”“说人话”，同时要了解受众的认知水平与接受习惯。科普人格化通过个性化的表达、生动的叙事、生活化的案例，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内容。传播者结合自身风格，运用故事、类比、实验演示等多种形式，将复杂的科学拆解成简单易懂的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都能轻松理解。这种接地气的传播方式，让科普不再是枯燥的知识灌输，而是一场有温度、有互动、有共鸣的沟通，极大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度与学习兴趣。

科普人格化有助于推动科学家主动介入公共生活，强化科普的公共价值。也就是说，科学家要把自己视为完全融入社会生活的专家，不再是旁观者。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从幕后走向台前，凭借专业的知识储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人格化的形象发声，澄清谣言、解读真相、引导理性。与之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主动参与科普活动，将科研成果与专业知识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内容，让科学真正服务于生活、服务于社会。这不仅能够确保科普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而且能有效推动科学精神的传播，让科学精神深入人心。

此外，科普人格化有效推动了破圈传播，扩大了科学的社会影响力。当下，科普突破了传统的形式，延伸到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多元渠道，形成了多元化、立体化的传播格局。科普IP的涌现，让科普内容具备了更强的传播力与感染力。一些优质的科普内容快速突破圈层，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甚至成为热门话题，使科学不再是远离生活的学术符号，而是融入日常、贴近人心的生活指引，有效提升科学的社会影响力，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科普氛围。

科普的人格化，实际上是以科学为核心、以公众为中心，以效果为目标的一种传播策略。当然，科普人格化也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过于关注个体的人设而忽视了内容的科学性。因此，只有坚守科学性的底线，才能让科普人格化始终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不断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科普内容。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

「信其人，故信其言」

漫谈科普人格化

王大鹏